

# ICT 化:迈向信息工业化的战略管理

■管益忻 启文

(上接 01 版)

## 6、从透支消费文化向合理储蓄平衡消费文化转变。

新生活方式的消费观应该是什么样的?“透支消费”还是“储蓄平衡”?中美消费模式不同,“透支消费”文化。中国人大多喜欢吃今天的饭,自己的饭,是一种“储蓄消费”的消费文化。实际上,过犹不及都不是正确的消费文化。未来重要实现以下几个转化:

(1)在幸福观上,从重奢消费幸福观向轻奢消费幸福观转化。这里存在着两种消费方式。重奢:肥吃海喝,大量的挥霍。追求奢华财富,享乐,崇尚金钱,甚至以支配物质的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为了所谓的生活“幸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个人满足为主,从来不考虑什么环境保护,资源浪费。节约的美德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越来越远,这就发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轻奢:有文化内涵支撑的消费,未来需要提倡这种消费方式。

(2)在生态观上,从高碳消费主导向低碳

消费主导转化。高碳主义污染环境。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行,美国以世界 4% 的人口消耗着世界三分之一的资源,光是汽车消费就使美国消耗了全球 1/4 的原油。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种高碳生活方式已经不能持续,需要向低碳消费主导转化,大力推进低碳社会的发展。

(3)在细琐生活观上,从肆意挥霍向节俭度日转化。麻木主义挥霍资源。开大车,住大房,铺张浪费,四季空调常开,日夜电灯长明,滥用化学品,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纸巾,是美国人的生活常态。

(4)在举债观上,从举债度日向量入为出生活转化。透支主义榨干未来。借贷消费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社会扎根了,自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美国人的消费已经超过了他们的产出,他们也因此成了“举债度日”的典型。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也是讲究适度的。子贡问孔子:子能、子贡谁更好一些。子贡满以为老师会称赞子能,因为他思维敏捷,而子贡有些时候来得慢,似乎不如子能,结果孔子说过犹不及。“不及”不好,过也不好,中国人现在消费不够,除了要增大收入,使人无养老、社保医疗等后顾之忧,收入用于能够消费外,应该提

倡适当贷款透支消费。但是如像美国那样大搞透支,消费也是不可以。

(5)在天人观上,从掠夺世界向“天人合一”转化。这里暂略。

(6)在市场行为观上,从不受制约向遵守制约转化。布坎南曾经说过:不受任何约束的所谓“自由人”,不是“人”而是野兽。所以,任何的市场行为,都需要受制度的约束,那种放任的市场行为必然会导致经济生活的无序。

## 7、在商业价值定位上,从单纯效率观主导向人文理念主导观转变。

ICT 化,即从 IT 向 DT 过渡,这就将引发对“犯二”经济学的批判。

(1)人之初、性本善,“经济人”假说之虚妄,必须批判。列宁曾经说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靠个人利益,个人兴趣。

(2)“犯二”的经济学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单纯效率陷阱。唯 GDP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教训。

(3)理念导向,商业价值定向的光明未来。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

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次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次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后发展最好的理念导向。

## 8、在品牌培育定位上,从“知名度”主导模式向“美誉度”主导模式转变。

有头脑的 ICT 产业品牌观如何打造?就是实现以下几个过渡:

(1)从低含金量向高含金量过渡。日本的国外资产等于国内资产的 1.8 倍,这就是资产含金量上的差别。品牌讲究的是不是资产的数量,而是资产的质量。

(2)从本土产业链向全球化产业链转变,这是全球化时代品牌发展的根本要求。品牌只有真正融入全球化,才有发展发展潜力和强盛不衰的生命力。

(3)(全球化)从“走出去”向“走上去”过渡。显然,今天的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走出去,而是通过竞争力和素质的提升在走出国门的同时“走上去”,真正在全球战略、价值理念、客户文化、品牌等方面高人一筹,才是真正的

走出去。而那些通过买粉丝、点击量等手段,最终都是行不通的。

## 9、在竞争定义上,从“物竞天择”向“人竞天择”转变。

向 DT 过渡意在利己更利他,必然突出“人竞天择”,必然向“物竞天择”发出挑战,是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彻底颠覆。同向为竞,相向为文。

从达尔文发表《天演论》以来,人们似乎以为这八个字是天经地义的了。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也需要刷新了。这是因为:

(1)“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2)从物质经济形态向信息经济形态过渡,迫切需要价值观念导向。

(3)从竞争为主制向竞和为主转变。

(4)从被动机制为主向主动机制为主转变。

(5)从加大资本投入主导向着重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导转变。35 年来近 63 万亿 GDP 的获得主要是靠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获得。

(完)

# “国企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的同一性与互补性

## ——对习近平总书记“供给侧改革”论述的理解

■李锦

(上接 02 版)

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这种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是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

如何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和国有股减持工作,如何做到国资监管部门以“管资本、管股权”为主,不再干预企业经营行为,如何破除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斩断行政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输送营养的“脐带”,如何完善企业公司治理,形成具有自生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公

司治理结构,如何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如何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也就是说,结构改革看起来是要提高某些领域的比例,但其实是政府要在这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让准入更加便利,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参与投资,甚至主导投资,而且政府要确保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能有合理回报。这是国有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

**第二架发动机:是在产业因素方面,调整供给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而结构是和总量相对应的,所谓结构,是指比例,结构改革最原始的意义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与“供给”紧密相连的一个词是“经济结构性改革”。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经济结构性改革”是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为这一改革划出四大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

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平衡为均衡的过程,也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从本质上说,调结构不属于一个经济增长问题,但从政策手段上看,这也属于供给侧管理的一种方式。

**第三架发动机,是在产品上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供需匹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供给质量,让中国的供给能力能适应领先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将各方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结合起来,不能从供给侧去激活新需求,很多人还是会到德国去背回一个烧饭锅具,还是会跑到国外商店里买下一个价值不菲的包包。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又怎么可能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经济结构又怎么可能得到优化重组呢?

**中国转型升级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精致生产”。**两个需要研发投入。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为 2.01%,与韩国、芬兰等国家接近 4% 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激励,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短时间攻关。“精致生产”就是把活做细,就是现在人们讲的“工匠精神”。中国大部分制造业摊子已经铺开了,但整个精细化程度还是比较低,这在中国的潜力很大。

**在这三架发动机中,国企改革是起决定性的动力。**制度供给是最重要的发动机。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持续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

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在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观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国企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经济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重心,“供给侧改革”将会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主轴。重点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国企改革”,与解决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的“供给侧改革”将相伴而行,共同促进,并行不悖。

(完)

# TPP 条款:中国国企改革的可行范本

■苏亮瑜 刘晓忠 越秀金控集团研究所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 个成员国达成协议满月之后,11月5日新西兰、美国等国相继发布 TPP 协定全文,这一共有 30 章 2000 多页的协议,再次在国内激发起新一轮庖丁解牛式条分缕析。

不论是对协议全文进行适应式解读,还是对冲式规避,抑或批判性借鉴,火药味已有所蔓延,曾经在国内泛滥的冷兵器思维没能蒙蔽决策层的理性思维,这在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的国企改革中得到了印证。对于 TPP 协议全文,除数字经济的条款、投资人与地主国投资争端(ISDS)等内容吸引眼球外,对国企设定的新要求 and 豁免条款设定等也同样受到重点关注,因为 TPP 的这些规定被看作是中国加入 TPP 的障碍。

## 塑造竞争中性

从 TPP 文本看,有关国企的条款并非一味排斥,其核心实际是为市场竞争中性诉求提供制度性框架。怀抱善意地解读,若国企条款的聚焦解是基于市场竞争中性,而不牵涉到对特定经济体的歧视,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当前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当前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承诺航向之一,国企问题不应是中国寻求加入 TPP 不可逾越的障碍。

确实,中国国企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所有制主体,以其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角色之重,在政企关系方面之复杂,其市场待遇、经营发展等问题将影响政府履行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成效,影响着市场竞争中性。TPP 对国企的立场并非消灭国企,而是通过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场域,理顺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避免国企在市场竞争中享有特权而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而当前推动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对国企进行公共职能与商业职能定位的不分类等,实际与 TPP 对国企的认定态度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事实上,自 1980 年代中国启动国企改革以来,都旨在通过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等方式,探索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1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作为国企改革指导意见的重要配套文件,其核心恰是有

效切割政府与企业间的脐带,实现由管资产、管企业向管资本的更高级形态转型,改革路径是甄别国资委体系、汇金体系等的竞争适应性,为对不同参与主体的定职定责,探索与国企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 赛马不相马

塑造竞争中性,在国资内部集中表现为赛马不相马。新发布的《若干意见》希望在政府、国资委、新增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路经、新增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可行路径,真正确立中、探索国企真实地位。就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事宜上,《若干意见》明确可以采取直接授权与间接授权两种方式,对于直接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倾向于借鉴“中投—汇金模式”,由财政部进行日常监管,而间接授权模式则源于国资委对央企母公司的改建,并由其进行日常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带有财政部和国资委谁主国资改革沉浮话语权的味道。这种直接授权与间接授权模式的并存,类似于在国企改革中引入“猫论”,哪种模式能更好地实现国资改革的诉求,决策层将会基于业绩进行取舍,显现出决策层在这轮国企改革中赛马不相马式的政治智慧。

显然,赛马而不相马有利于促使国企改革走出进退维谷,进三退二的局面,使改革不

致于陷入无限制的坐而论道,耗损改革动力。就目前而言,无论采取国资委模式和还是汇金模式,前路都并非坦途。

以前者为例,成立于 2003 年 3 月的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特设的事业单位,在推进政企分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没。国资委成立之前,大多数央企分属不同的政府部委,很多央企更像是所属部委的自留地,既存在非常严重的政企不分,又存在九龙治水等问题。随着国资委的设立,非金融央企的出资人职能逐步集中于国资委,并理清了央企与各部委的行政隶属关系,国资委开始履行对央企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的职责,央企不分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政出多门、多头监管问题也得到缓解。但作为国有资本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老板加婆婆的身份,使其面临新的政企不分和自我监管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国资委的分权和自我监管的不完善,对国企在国资委上享有经营自主权在认识上以及在具体操作上下不尽相同,部分政府部门觉得对央企行使行政职权有鞭长莫及之感。在“谁的孩子谁抱”的权力博弈和管控思路主导下,这反过来使国资委“额外”而被动地肩负了更多公共管理职能,使旨在推动政企分离的国资委成为了政企不分的病灶。

同时,国资委履职以来,纵然推出了诸如主辅分离、引入外部董事制度等改革,但不得不说国企的改革航向仍然不够清晰。之前提出的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主要集

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等领域的思路逐渐淡化,甚至出现了一轮国企退潮。近年来国企持续上行的高负债、国企主导领域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 PPI 连续 43 个月为负,国企盈利能力下降,有的甚至面临破产重组,国企主业不突出,乱投资问题再度出现等,也凸显了调整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必要性。

而以汇金模式为例,中央汇金当时是为配合金融机构改革而设立的,由于汇金的资金来源为外汇储备,为此成立之初的主管单位为央行,随着财政部通过设立中投公司运营部分外汇储备,汇金最终划归中投。作为政企隔离层的中央金融控股平台,汇金起到了政企分离的作用,客观上也具备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雏形。不过,尽管一行三会的分类业务监管,使汇金公司没有变身为老板+婆婆的特殊机构,但由于国内金融领域以管控为主的体制和机制,及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等,使汇金公司的行政色彩要相对浓于国资委旗下的诚通集团和国投公司等,同时汇金的投资灵活性也相对较差,旗下的工农中建交等银行也存在同业、同质竞争性,金融资产的优化重组等还很难在汇金层面有效展开。

同时,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方面,汇金公司也缺乏亮点,如旗下控股的主要金融机构,自股改上市后,其股价经历了数论过山车式的起伏,经营业绩曾经独占鳌头的银行类机构,如今却不同程度地面临不良资产日益凸显的耗损。此外,汇金作为主要金融机构的主要股东,其在行使出资人职能上也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更多地类似沉默的大财务投资者。

显然,当前国资委模式与汇金模式,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若基于现行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航向,未来的国资监管模式,不会是单纯在这两种模式上的取舍,而更多是兼容并蓄地探寻新的模式。当然,牵制现行国资改革的两大问题:一是监管理念如何从管控向服务转型,二是如何协调部门厘清不同部门的职责,探寻不同部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将改革的潜在阻力转换为改革的动力。

而要探寻重组的更适合中国国企改革的模式,将国企改革主导权的部门之争转换为赛马游戏,无疑可有助于将各部门竞争主导权的分歧,转换为改革前行的动力引擎,即在明

确以管资本为主基调、剥离国资委公共职能,及明确监管理念要从管控向服务转型等条件下,为国资委和财政部旗下的汇金公司提供试错容错的宽松环境,激励其探寻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优化布局的新模式、在允许试错容错的背景下,哪种模式更有效地兼顾政企分离、国资保值增值和国资优化布局等绩效,哪种模式就应该被确定为资本监管的主模式。

## 改革思路决定出路

以资本监管为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将是必要的一环,关键问题就是谁来主导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理论上,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又要尽可能缩短所有权代理链条过长和高代理成本。国资委应作为一个大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为宜,而要将国资委定位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际上同样难以克服自我监管的问题。

因此,国资委可能两种定位:一是以出资人身份将自身打造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一是塑造成类似于一行三会的资本监管机构,即充当国家能源审局功能等。当然,也可以考虑参考国家的审计局模式,直接将国资委放置在财政部旗下,将财政部的企业司与国资委合并。

总而言之,当前确定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企改革,客观上有助于淡化企业的所有制身份,逐渐降低国企这一特殊企业实体的身份束缚,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良性的制度环境,让企业间的竞争真正基于市场的真实才干能力,而非基于企业性质和身份。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样的国企改革航向,就更容易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推动国际经贸博弈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毕竟,中国国际经贸空间的有效拓展,首先需要打破的路径依赖的禁锢。思想解放和突破了,行动就不会受到各种不必要的干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可信经验。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中也佐证了这一经验。因此,不应把 TPP 看作美国等经济封锁中国的安排,TPP 的某些有利于中国改革事业的积极表述和安排,还可当作是中国改革路径的参考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该有这份自信,具有这份担当。